

20 世纪初的中国，时局动荡，云谲波诡，新旧力量冲突、中外思想碰撞异常剧烈而复杂，中国正在内忧外患中迎来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个时代的变迁，需要新的信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的驱动。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者、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创者约翰·杜威的访华，无疑是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一大盛事。

一位哲学家的中国之旅

杜威于 1919 年 5 月 1 日抵达中国。几天后，五四运动爆发。这场最初抗议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民族运动，迅速演变为思想文化革命。杜威夫妇原计划当年夏天回国，却被中国人民追求独立民主的斗争深深吸引。杜威敏锐地意识到这场运动中所蕴含的革命力量，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的社会变革，一再推迟归期。杜威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中向西方宣告：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的国家情感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他不仅以观察者身份见证历史，更主动参与中国政治重建与思想转型。

1919 年至 1921 年间，杜威足迹遍及中国 11 个省份，发表二百余场演讲，内容涵盖社会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和西方思想史。这些演讲通过《晨报》《新潮》等报刊传播，风靡一时。在江苏教育会宣讲“平民主义的教育”时，“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杭州演讲吸引两千余人，北京尚志学校听众虽挥汗如雨，无一离坐。贺麟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者首推杜威。

彼时中国历经政治革命挫败，亟待思想突围。杜威学说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获得胡适、蔡元培等自由派、梁启超等保守派，孙中山、陈独秀等革命派共同认可，原因有三：其一，其倡导的“民主”“科学”契合五四知识分子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诉求；其二，相较同期来华的罗素——后者长于数理逻辑却对改革方案闪烁其词——杜威基于实地考察提出切实建议；其三，其思想与中国传统深度共鸣，蔡元培称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学说颇多相同，实用主义“经世致用”理念更与儒家传统不谋而合。杜

杜威与五四运动的历史相遇

□ 李媛媛

威因此被称作“西方的孔子”，其学说成为东西文明互鉴的桥梁。

空谈之弊与科学之刃

杜威亲历五四运动，虽未在演讲中直接提及，却构成其思想探讨的背景。他不断追问：什么是真正的爱国？未来的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才是个体与国家的良性关系？作为长者和师者，他如此评价学生运动的利弊：利在更为深切明了政治、教育、商业的情况，培养了公共利益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弊端在于爱国心切，往往感情用事，难以专心读书，在教育方面遭受损失。对此，他的建议是：爱国心也要有智理作用。因为情绪是靠不住的，还要用理性的观念去引导他，纠正他，才能真正造福国家。要是率意妄行，不但无益，恐怕有害！他建议青年人不要消极排外，而应该去做积极的事业，即推广教育，改良体育，发达实业，提倡国货，或增进平民的生产和消费力。其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因此，必须胸怀更远的目标，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

杜威剖析中国近代革命教训，认为辛亥革命因缺乏思想与道德准备沦为形式化政治变革，故主张政治革命需以思想革命为先导，且须与民众生活联结。其“理智革命”方案包括三方面：其一，拒斥空谈，知行合一。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盎司经验胜过一吨理论，强调行动验证真理。其二，科学思维，具体施策。主张以实证方法取代笼统空谈，杜威呼吁中国人“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而要利用科学的智识来指挥一切，向导一切”。其三，团结行



动，培育共和。他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重家族主义而缺公共精神，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杜威的回答是：欲养成共和国之精神，有两大要素：“第一要素为爱自由”，“第二要素为共同动作”。这些思想切中时弊：实用主义为浮躁思想界注入务实精神，以科学方法论矫正空谈积习，公共性构建直指传统政治缺陷。杜威的启蒙推动了中国思想、教育及政治理念的革新，其倡导的理性精神、科学态度与集体行动逻辑，为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改良与革命交织的 20 世纪初，他提示了一条通过思想奠基、科学指引与公共精神培育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碰撞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对杜威学说报以密切关注。1919 年 7 月，周恩

来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期间，就在“创刊号”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1920 年 10 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长沙演讲，毛泽东被特邀为此次演讲的记录员；1921 年 4 月，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日记中提及过杜威的学说。1919 年 9 月，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71 类，其中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1920 年 3 月，毛泽东到黎锦熙处，专门讨论了近代哲学派别（柏格森、罗素和杜威）问题。6 月 7 日，在致黎锦熙信中，又写道，“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这些行动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建立在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广泛了解和吸收其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杜威的演讲既推动思想解放，又以科学理性唤醒民主意识，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铺墊了思想土壤。

杜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

殊途同归之处。1919 年“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与代表实用主义的胡适之间发生的辩论看似对立，实则内核相通。胡适反对空谈抽象“主义”，主张以具体问题为研究起点，强调一切主义只应作参考；李大钊则提出主义需兼顾理想与实用，学理应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杜威本人同样认为，解决具体问题需与整体观念结合，如航海需罗盘亦需地图。两者虽方法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侧重阶级分析与社会革命，实用主义强调经验验证与新进改良——但都追求改造现实世界，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且同受黑格尔哲学影响。杜威批判资本主义压迫，指出工人消极抵抗源于生计所迫，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谋而合；其反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亦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一致。

然而，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最终决定了历史选择的不同。哲学上，杜威持经验一元论，马克思则以实践为根基；行动路径上，杜威主张个体经验改良，马克思倡导阶级革命和制度革命；传播范围上，杜威的影响限于知识精英，马克思主义深入劳工大众。在 20 世纪初救亡图存的紧迫语境下，中国急需能凝聚底层、指明方向的战斗性思想。当温和改良无法应对民族危机时，马克思主义以其彻底的革命性与组织动员力，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

杜威的预言与中国现代化回响

百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尘埃落定之时，我们回顾杜威与五四运动的这次历史相遇，会发现他在中华传统与

世界文明相遇之时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杜威认为：“现在文化的新问题不是往前行去环绕地球的问题，而是东西文化怎样互相接近怎样互相影响的问题。”杜威认为，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直多元性与普遍性共存，对于异质性因素采取包容态度，兼收并蓄、合而统之。就此，他提出了文明汇通的希冀与期待。

其一，立足现实，走中国本位的发展道路。20 世纪初，杜威即主张中国现代化不可复制西方或日本，而应立足自身，“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既补救文化危机，又补益西方缺陷。他认为中国若自主追求经济目标，必能设计出优于西方的方案。今日中国道路的成功，印证了这一预见——在汲取文明源头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观念与制度创新，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全新范式。

其二，辩证看待西方民主自由。杜威剖析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本质，指出自由过度导致经济不平等；契约自由若缺乏能力平等基础，反成不自由的枷锁。他警示中国须批判性看待西方传统，而非全盘接受。当西方霸权鼎盛时，杜威已在其文明中看到隐忧，却在中国发现实现社会理想的可能性。

其三，重估传统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之际，杜威提醒：中华文明千年积淀的人本观念与系统思想，经科学方法整理后，可为现代社会科学所用。他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强调站得住的文明必有可靠根基，若彻底断裂文化根脉，民族将丧失立身之本。

其四，推动文明对话。杜威对东西文化进行了对比：东方重家庭伦理与切实经验，西方尚个人权利与抽象智理。但他强调比较非为论高下，而在取长补短。中国作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历史上以包容姿态统合多元文明，此特质正可回应“文明如何相互影响”的世纪之问。在零和博弈思维盛行的世界，杜威对文明汇通的期待，既矫正冲突思维，也为中国提供启示——兼容并蓄的智慧，恰是构建新文明形态的关键。

一部情理交融的劝学篇：《送东阳马生序》

□ 高 硕

《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宋濂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篇赠序体散文，它不仅承载了深厚的文学底蕴，还通过生动的叙事、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语言艺术，展现了宋濂的儒家教育理念。

文本结构与叙事策略

《送东阳马生序》具有严谨的结构与巧妙的叙事策略。整篇文章围绕“劝学”这一主题展开，采用“自述一对比一劝诫”的三段式结构，层层递进地揭示了自己对于学习的理解与体悟，从而构建了一部情理交融的劝学篇章。

文章以自述寒窗苦读为开篇，设置了情感的基调。宋濂通过“余幼时即嗜学”来引出自己对学问的渴望，并回忆了自己少年时期的艰难求学经历。诸如“假借藏书”“趋百里问师”“负篋曳屣”等细节的描写，生动刻画了一个寒士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依然不改求学的志向。这些细节不仅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性与代入感，也让读者感同身受，感受到学习道路的艰难与执着。

以“今诸生学于太学”为转折，文章通过对比手法，讲述了当下太学生的优越求学环境。列举了“廪食”“典籍”“师资”等方面的优渥条件，突出自己曾经困顿与当下求学环境的富足。这种对比并非简单批判，而是通过反差，指出即便在优越条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专注与努力，也难以取得学业上的成就。进而指出文章的核心观点，学业不精、品德不成，不是取决于天赋，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专心致志和努力。

宋濂在此以“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作为收尾，通过赠言劝学的方式，完成了从个体体验到普遍意义教化的跨越。将自己在寒窗中的奋斗历程升华为共通性价值的教诲，强调心无旁骛的劝学精神。这一部分的写作策略，通过个人经验的分享，使得整篇文章不只是对马生的劝勉，更是一种对所有学子的普遍呼吁。他强调通过专心致志的学习才能成就学业与人生这一训诫，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更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智慧。从个体叙事延展到群体教化，劝学的主题

也具有了广泛的道德性与共通性。

思想内涵的多重维度

宋濂在追忆早年求学经历时，“立侍左右”“俯身倾耳以请”等细节描写，生动再现了传统儒者的求学之道。这些看似简单的肢体语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为学之理，侍立时的谦卑举止，彰显着求知的诚意。这种将身心完全投入学问的态度，正是宋濂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重要根基。其背后所遵循的，正是《礼记·学记》中“师严然后道尊”的为学准则，唯有确立师道的庄严，学问的真谛才能得到真正的传承。

文章中“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的自述，诠释了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境界。这种安贫乐道的态度，正是对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切身体验，在物质匮乏的处境中，他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热忱，将精神追求置于物质享受之上。宋濂以自身经历表明，真正的儒者能够在清贫中坚守求知的初心，通过克制物欲来成就德行。

宋濂从“家贫，无从致书以观”的困境起步，到最终位列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这一跨越展现了科举时代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范例。在文章中，他对比自己当年的艰苦求学与当下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揭示了个体通过知识获取功名的价值，也反映了明初科举复兴背景下寒门士子实现阶层跃升的普遍路径。

宋濂一方面真切记述“每假借于藏书之家”“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的求知困境，凸显了书籍资源这一外部条件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更着重指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这一观点，凸显了学习者主观能动性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既重视客观条件又不囿于客观限制的认知方式，超越了传统劝学文本中片面强调“囊萤映雪”的单一维度。这一见解与现代教育心理学中关于“刻意练习”和“成长型思维”的理论研究相契合，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前超性。

艺术特色与文体创新

与唐代文学家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起兴的借古抒怀不同，宋濂以“余幼时即嗜学”的平实叙述，通过“手自笔录，计日以还”等细节描写，将个人求学经历转化为生动的劝学教材。韩愈以“董生勉乎哉”的抒情笔调抒发离情别绪，而宋濂则以“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直白地进行表述。这种以真实经历为基础、以劝勉后学为目标的写作方式，使赠序从多抒离情、重文学性的传统范式转变为具有实际教育意义的文本，反映了明代士人注重经世致用的观念。

宋濂以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与元末“玉山雅集”“铁崖风流”等纤秾缛丽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文中“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平实叙述，摒弃了雕琢修饰，以白描手法再现寒门学子的求学场景。这种简朴自然的表达，与归有光《寒花葬志》中“曳深绿布裳”等细节描写异曲同工，都体现了返璞归真的审美追求。这种语言风格的转变，既矫正了元末文学过度“缘情”的倾向，又开创了明代散文的新风貌，展现了明初“雅正”文风的独特价值。

文章巧妙运用多重对比手法，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劝学体系。本文通过“手自笔录”与“今诸生学于太学”的今昔对比，展现了求学环境的差异；以“缊袍敝衣”与“同舍生皆被绮绣”的物质对比，凸显了精神追求的可贵；更以“俯身倾耳以请”的谦卑态度与“门人弟子填其室”的求学盛况相对照，强调学习态度的重要性。这些对比层层递进，最终归结于“心不若余之专耳”的核心论点，使劝学主题自然显现。

历史语境与创作动机

作为致仕归乡的帝师，宋濂以“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的谦逊姿态向后学传授经验；作为文坛领袖，又通过“预君子之列”“承天子之宠光”等表述，完成了对自身儒者身份



的终极确认。这种双重身份的融合，使宋濂既有“日侍坐备顾问”的庙堂高度，又饱含“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的师者情怀，展现了明代士大夫在仕与隐之间的精神追求。

文章中“县官日有廩稍之供”的记述，呼应了明初“治国以教化为先”的国策。文中“承天子之宠光”的表述，既是对朱元璋文教政策的认同，也暗含对朝廷教化方针的赞许。这种书写巧妙地将个人求学经历与明初文教建设相结合，通过“有司业、博士为之师”等细节，展现了当时教育体系的发展。

文章中“益慕圣贤之道”的表述，与其《文原》“尧、舜、文王、孔子之文”的主张一脉相承，体现了金华学派“明理躬行”的学术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在强调博览群书的同时，又以“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点明治学要旨，这种既重博览又强调专精的治学态度，深植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中“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的治学理念，并

在实践中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拓展与创新。

学术史评价与当代价值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自清初以来逐渐成为散文典范，其经典地位在历代文论中得到持续确认。清人评点中“以常情写至性”的审美判断，恰切概括了文本白描叙事的艺术特质。现代学界普遍关注文中展现的知识伦理，认为其通过个体经验折射出的治学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面对当代教育困境，文中“以中有足乐者”的治学态度，为“内卷”时代的学子提供了返璞归真的精神参照。而宋濂的寒门奋斗叙事，既彰显个人奋斗的价值，也引发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深层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借书”与“程门立雪”的典故互为映照，共同塑造了儒家文化中求学问道的典范形象。这些文化符号通过教材、典故等形式持续传承，其精神内核在当代教育语境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